

xitanxue
yu
hanziyinxue
xinlun

譚世寶 著

志
星
學
子
與
漢
字
音
學
新
論

譚世寶題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SHIJI
YU
HANYU
YU
YU

SHIJI
YU
HANYU
YU
YU

志
景
今
古
漢
牛
書
畫
詩

子
畫
印

中國書畫出版社

悉曇學與漢字音學新論

譚世寶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悉曇學與漢字音學新論/譚世寶著. - 北京:中華書局,2009.9

ISBN 978 - 7 - 101 - 06871 - 9

I. 悉… II. 譚… III. 梵語 - 語音 - 關係 - 漢語 - 語音 - 研究 IV. H711.1 H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23230 號

書 名 悉曇學與漢字音學新論

著 者 譚世寶

責任編輯 李肇翔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張 14% 2 插頁 字數 350 千字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6871 - 9

定 價 46.00 元

敬獻給：

我平凡而偉大的母親——李
群芳女士，以報答她在艱難的塵世
歲月，給我的養育、教誨、期望與祝
福！

總 序

二十五年前，著名生物學家和哲學家愛德華·威爾遜教授在其社會生物學基礎上提出“人類行為的四個基本類型：攻擊性、性、利他主義和宗教”（Edward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8, p. 97）。這一理論有力地向我們揭示了人性的內部結構。就此，去年我曾與威爾遜教授在哈佛的一次學術約談中表達並一起探討這樣一種思考，即科學不僅是人類特有的用以有效認識和把握自然的知識系統，而且是延伸和增強人類對自然之控制與攻擊力的攫能系統；不僅對社會、而且還應對文化從生物學的角度加以研究，探討我所說的“文化生物學”。如今，科學技術及其發展使人類的攻擊性獲得了越來越有效的擴張；現代人所受科學之惠可謂不勝枚舉，科學文明幾已成為現代文明的代名詞。一個非常現實的情形是，現代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各個領域幾乎都有賴於科學和它的不斷“升級”。在人們眼裏，科學的就是合理的、有價值的、不容置疑的，因為，它就是我們人格的外化。事實上，過去兩百年科學給我們帶來的福祉，勝過此前的總和。但令人深思的是，宗教與現代科學比肩而立，古老而不衰竭，甚至科學還會受到來自宗教的批判和挑戰。科學文明所引起的人類社會問題和生態問題，同宗教引起的社會問題和對生存的關注一起，纏結難分，使處身其中的現代人感到困惑。

質言之，宗教千載不已，乃源於人類的一種深切關懷：人類有沒有此岸之外存在的可能？這似乎是一個超出乃至遠離現實邏輯

的問題，但卻是千古依然的問題，它源於人類自我意識進而人性的升起，以及由此不斷膨脹的對外部世界的攻擊和攫取的能力及欲望。在已知的世界，祇有人類產生了自我意識，與自然母體出現了對象化，提出“認識自我”的命題，認定自己的價值和存在的意義。於是，人類便在日益升級的層面上使自我得以實現。由此而生疑問：難道這麼珍貴的生命存在將隨其物理形態的結束而終結麼？在這種張力作用下，天堂、淨土、仙境、極樂世界等等，作為人性向着“來世”的不同延展方式，在各種宗教中被描畫出來。

同宗教一樣，科學是人性的外化。隨着科學理性在文明中之升起，它在人類文明史上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人們用科學來表達和伸張他們的意志和力量，在現實維度上標示人性的向度。換句話說，科學是人類特有的攫能系統，它是社會共同人格在現實維度的膨脹形式。因此，任何試圖對科學採取的否定，都將被視為是對人性與人類意志的威脅和否定，因而是危險的和不可接受的。崇尚科學，以科學為萬物之尺度，以科學為文化之正，這是現代文明的一大特徵，因為，科學這種理性文化使人類從整體到個體都獲得了空前強大的攫能性，人類從未像現在這樣擁有對外部世界的強大攻擊力和控制力。科學使人類獲得了過去許多宗教承諾的祇有進入神界纔有的能力（比如戰勝許多疾病，延長人的壽命），許多人因此有一種似乎不再需要也不再畏懼上帝鬼神的感覺。這是人性的自然擴張，人類不會也不可能放棄對科學的崇尚和追求。

然而，遍閱千萬年人類宗教和信仰的滄桑歷史，我們卻不得不說，人類的內在世界並沒有他自己常常表白的那樣完美無缺；“荒誕”，以及對更高形式的荒誕的需要，似乎也是人性的重要一面。自古以來，人類社會中總是不可避免地有一部分人要走向宗教信仰；而且，科學從未回答甚而加以否定的是人的終極關懷問題，而這恰恰是人性另一維度長期存在的、有“思想”的人類所難以避免

的問題。這意味着,至少是相對於特定人群而言,科學理性在精神層面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它並不一定能夠使他們的精神世界獲得滿足,使人獲得終極意義上的“自我實現”。由此可以理解為甚麼美國新教思想家保羅·蒂利希說:“宗教是人類的終極關懷。”作為人類特有的文化,宗教是人性的一種表現,人類用宗教信仰表達着某種超越現實的追求。

每個人都是從特定的傳統中走來;特定的傳統造就了特定的社會,特定的社會就存在於特定傳統的外化和更新、流變過程之中。宋代以後,以自省內求為特徵的文化思潮漸成其勢,中國文化逐步內向化,對外部世界的激情消失,而越來越深地耽溺於內部世界不能自拔。昔日尚具外向性的“格物致知”探索,到明代王陽明那裏已被改造為“致良知”的學問:“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以此為“徹上徹下功夫”(《傳習錄》下)。可悲的是,以這種思想為代表的心性之學長期泛濫,又隨封建社會及其道德和價值體系之江河日下,對中國文化之攫能性構成自我閹割,從而注定了近代中國之孱弱。與此同時,傳統宗教也經歷了由“聚形”到“散形”的過程,昔日傳統宗教多已衰弱,其宗教思想和證神體系散入民間,大量新興民間宗教倡行於世,社會倫理、審美、價值觀念多元化,對傳統社會秩序構成威脅,政治張力陡增,官民衝突不斷。而按照歷史規律和社會的自組織性邏輯,應有的宗教改革、重整各大宗教(“聚形”)並使新的外來宗教“漢化”的過程,卻始終未能出現。而自 19 世紀,經受侵略蹂躪之苦的中國人似乎看出自己落後挨打的根源在文化,於是民族自強的努力被訴諸於文化變革,這種努力的失敗又一再地被歸因於自身文化問題。於是,中國人多次強烈地排斥和否定傳統,導致傳統文化殘裂,道德價值觀念混亂。這是中國人必須慎思的問題。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逐漸加深的信仰和道德問題,

與過去的年代裏對傳統的否定和破壞，自有深刻的內在聯繫。確實，傳統在不斷地被超越中獲得生命力，時代在繼承和突破中前進；我們不怕丟掉了破舊的傳統、蒼白的鬼神，但我們要怕的是把民族的內在整合性、民族的靈魂也一併丟掉了。

學人當以時代之甘苦為甘苦，以審思既往思慮未來為己任。我們需要斟酌中外，檢閱古今，重建我們的傳統。在這個過程中，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應納入吾人之思，“兼陳萬物而中懸衡”（《荀子·解蔽》）。如此，則庶幾可臻大道哉。

學問是荒原野草，自本自根，求之不得。山東大學宗教、科學與社會問題研究所的專兼職科研人員，依各自之學術志趣，就某些方面的問題深入探討，所思所得，皆寒燭心血之凝聚；又選國外部分學術名著加以翻譯，一同彙成系列，陸續出版。謹此為序。

山東大學宗教、科學與社會問題研究所所長、教授

姜生

2002 年歲末識於泉城

“異軍蒼頭突起”

——序譚世寶《悉曇學與漢字音學新論》

我知道譚世寶先生，是將他的名字和悉曇學這個術語“繫聯”在一起的，此話怎講？我學音韻學，是從老師那裏、是從趙蔭棠先生《等韻源流》書裏知道“悉曇學”這個名詞、這門學問的。從那時起，我對“悉曇學”這門學問就懷有敬而且畏之心，因為漢語音韻學裏的一個分支學科等韻學以繁難著稱，這等韻學是借鑑梵語悉曇學建立起來的，甚或可以說是導源於梵語悉曇學的，而梵語是印度古老的語言，號稱最複雜最難治，所以在我的心目裏，研究悉曇及其與等韻的關係是很難很難的。若干年前在我任教的學校門口的新華書店的櫃檯上，翻看《中國文化》某輯時，我看到了一篇文章的題目是關於悉曇學的，這立即引起我的注意，當今居然有人研究悉曇學！值得敬佩，值得敬佩！再看作者是誰，“譚世寶”，陌生的名字。以後我又在一個杭州召開的學術討論會的論文目錄上再次看到譚世寶先生的名字，文章也是關於悉曇學的，因而印象更深了。音韻學歷來被稱為絕學，給《文鏡秘府論》和《顏氏家訓》作詳注的王利器老先生也這麼講過，研究梵漢對音、研究梵語悉曇學及其與漢語等韻學的關係，完全可以稱得上“絕學中的絕學”。

世寶先生的大著是研究“悉曇字音學的傳習與漢字字音分析的發展的關係”，這是個高難度的題目，研究這樣的課題是需要勇氣、學養和韌性的。唐人詩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世寶

先生寒窗十載，終於成就了大著，如今放在我們面前的，一柄寶劍，凜凜寒光。我讀了這本書，祇覺得勝義繽紛，許多高見令我推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幾點：

1. 通過對“切”、“反”、“切音(法)”、“切韻”、“反音(法)”等詞在歷史文獻中的漫長而錯綜複雜的源流關係的細緻考辨，求取了已被諸多後起的歧義或誤解所掩蓋的有關名詞術語的本義真詮。例如，“切音”、“切韻”的“切”字今普通話有“qiē”、“qiè”、“qì”三種讀音及不同的意義。今人多讀為“qiè”，解釋則眾說紛紜，而多把“切”、“反”之義混為一談，因而也把“切音(法)”、“反音(法)”等混為一談。世寶先生逐一考辨釐清，證明“切”應取其本音“qiē”，以其本義解作切分，“切音(法)”就是指把字音加以切分(的方法)。而“反”或作“翻”，正讀為“fān”而非“fǎn”，其正義與“切”相反，應解作反(翻)合，“反音(法)”又稱“反語”、“反字”，略稱“反”，本來是指用兩個文字符號的音合併為一個文字符號之音(的方法)。

2. 世寶先生還指出：“《切字要法》的‘切字’其實是把漢字的字音分切為聲、韻二者之法。此法實際是原始的純漢字的‘切音法’的現存最早記錄，其來源可追溯至漢末傳入中國的悉曇學。它既是‘反音法’的基礎，因而也是漢字字音的輕重、清濁、五音、四聲等的分析和歸類的基礎。總之，此即為漢字的字音分析學，亦即古人所說的‘切韻之學’的基礎。”

3. 通過對梵文字尤其是古梵文悉曇字的結構系統的直接研究分析，世寶先生指明梵文是音節文字，而不是音素文字，悉曇字不宜用拉丁文轉寫的形式來作研究，此點很為重要。

4. 通過對古梵文悉曇學的人華傳播過程所引起漢字的字音分析學的產生、發展過程的探索，世寶先生論證了：(1)悉曇學的人華導致了“進行漢梵文字比較研究的理論基礎的確立與發展”。(2)華

人在參與佛經的對音翻譯及研讀中掌握了悉曇學的字母“切音(法)”及“反音(法)”的原理及模式。(3)華人在熟習梵漢對音的“切音(法)”及“反音(法)”的原理及模式的基礎上,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形成了純用漢字符號作工具的字母分切和拼注漢字字音的“切音(法)”、“反音(法)”及其模式。並由此推論:如果在漢代入華的不是佛教的印度悉曇學,而是基督教的羅馬字母學,則倣效表音素的羅馬拼音字母的漢語拼音字母就有可能提早一千多年產生。

5. 此書不但維護沈約的“四聲”發現權,認定安然《悉曇藏》所錄載的就是沈約《四聲譜》的原本全文,而且論證了《四聲譜》分切聲調的原理、方法、工具和成績,指出:“漢字字調藏於音節的位置及其被首先發現和分析的困難”,“《四聲譜》在漢字字音分析史上所直接作出的新貢獻,就是在完成四聲字調的分切的同時,連帶用四聲來對韻類作進一步的分切,使韻類按四聲分為韻部”。

世寶先生將他三年前的博士論文交付出版時作了增補,而且在2003年底又加了個跋。因為是年7月傅定森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反切起源考》,力排漢語反切法導源於梵語悉曇學的學說,而譚世寶先生則一直堅持沈括、鄭樵的“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的觀點,他在這本書付印前夕加了跋,針對傅定森先生的新著重申己見。傳說譚說,孰是孰非,當然可以繼續爭辯。我在這裏想指出的是,這個跋加得好,具有另一種意義:世寶先生將他的著作推到了學術前沿,即2003年底的前沿。我覺得,中國大陸近年出版了許多學術性的書,但是也無庸諱言,若干著作存在着不吸收最新成果、不觸及最新動態、不評騭最新論著的毛病。譚先生則反是,這種學風值得效法。

世寶先生的這樣一本高深著作的問世,必然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我想國內研究悉曇學的專家王邦維、儲泰松等學者必然要積極跟進,發表他們的高見,音韻學人也會爭先拜讀。

無疑的，這些都會促進學術的繁榮。學術的繁榮必然包含不同意見或觀點的爭鳴。像世寶先生書中涉及的問題如此之廣，其中有些可能在學界存在歧見。例如，這書裏兩處提到顏之推可能襲用陸德明的文句，署名【隋】陸德明著的《經典釋文》事實上比署名【北齊】顏之推著的《顏氏家訓》起碼早六年。不過據我所知，顏之推歷梁、北齊、北周入隋，卒於開皇十年（590）後，大約在開皇十餘年中，此據繆鉞《顏之推年譜》（載《讀史存稿》，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是否可能遲至仁壽年間（601—604），尚可存疑。關於陸德明《經典釋文》的成書時間，王利器先生有長文《〈經典釋文〉考》（《曉傳書齋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歷敘諸家之說，其結論與世寶先生同。而孫玉文先生《〈經典釋文〉成書年代新考》（《中國語文》1998年第4期）認為，《經典釋文》寫定於王世充割據稱帝期間（606—621），看來這個問題學界仍在討論中。

我有個愛好，就是經常逛新書店、舊書店，這十餘年經濟大發展，出版事業也隨之興旺，出版了很多學術著作，可是我有一個朦朧的印象，近來佳著不是太多。世寶先生的《悉曇學與漢字音學新論》可謂陽春白雪。世寶先生是雙博士，他在取得漢語學博士之前還曾師從著名歷史學家王仲軫先生，獲得山東大學歷史學博士。由於這個緣故，我特擷取偉大的歷史家司馬遷的“異軍蒼頭突起”這句話，來祝賀《悉曇學與漢字音學新論》的問世，也用來作為拙序的標題。

魯國堯

2004年春草於隨園北鄰

內容提要

本題目是既古老而又新穎，既很有意義而又十分複雜的課題。通過對有關研究史及原始資料作了較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本文得到了如下主要的新認識和結論：

1. 證明“切”、“反”本來是指兩種相反的方法：“切”就是切開，“反”就是反合。“切音”和“切韻”本來都是指對音節進行分切，後引申為對音節的分析研究。而“反音”、“反語”則本指把兩個字的音拼合成第三個字之音。
2. 證明沈括、鄭樵等人所主張“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之說，是有充分歷史根據的公論。自明末以來纔形成的對之質疑、反對，與支持、肯定以及折衷的各派意見爭論不決之局面，主因是由於論者缺乏對悉曇字音學的研究。進而修正了不少論著都以為梵文是音素字母文字之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各種誤說。
3. 填補了一個重大的空白點，就是對漢字的字母切音法的因果作了專題研究。從中得到如下新看法：（1）漢字的切音法，是漢字字音分析得以建立的最基礎的方法。（2）現存於元刊本《玉篇》的“切字要法”，是最古老的漢字切音方法。（3）古人真正練習和應用反音法，是要先進行切音，然後再進行反音的。由此揭示了在“反音法”中隱藏有“切音法”的基本方法和範例。
4. 對悉曇學的傳習與漢字的反音法的關係作更全面深入的考證

分析,主要有:“‘反音’的本義及其來源各說評議”、“悉曇學所傳的梵漢對音的反音法及其模式”、“梵漢對音字的反語模式對純漢字的反語的影響”、“悉曇家及儒家所失傳的古來反音法探秘”等論題,都是填補了一些關鍵的空白點的新研究成果。

5. 圍繞當代學者對於陳寅恪名作《四聲三問》的兩大派的論爭,展開分析論衡,並對古代的各家之說也作了分析,從而得出如下基本的新看法:(1)沈約《四聲譜》,是開創“四聲”學說的奠基性的成果。它的產生標誌着漢字字音分析的基礎構建工程已完成。本文排除了沈約之前已有“四聲”之論的各種誤說,重新確認沈約為“四聲”之論的開創者、漢字“切韻之學”的祖師的歷史地位。(2)考定《悉曇藏》所錄載的就是《四聲譜》的原本全文,詮釋其內容之真義與價值。(3)一些論著對沈約等人首創“四聲”之說的否定或貶低,原因就是他們把學者對“四聲”所作的研究結果——“四聲”之說,與被研究的“四聲”的自然存在,這兩者混為一談。這也是最近十多年來,纔逐漸多人對《四聲三問》作出非議否定的主因。本文在論證陳氏的真意之同時,對各種誤解都作了糾正。(4)在基本肯定《四聲三問》的前提下,本文既修正了顧炎武的“四聲之論,起於永明,而定於梁陳”之說,也修正了陳寅恪的“四聲之說,成立於永明”之論。證明“四聲”之說直到隋唐時期纔真正為學、政兩界所公認和確立。(5)四聲分析法的產生,標誌着漢字音節的聲、韻、調的三種基本的分析方法都已完成。這三大基本的方法與成果,在隋唐時成為被大一統的皇朝中央政府所認可推行的韻書的工具和方法。(6)由於劃分字調的成果可以用平、上、去、入作為通用的名稱標誌加以確立和固定,加上《四聲譜》的成果已在實際上得到認可和發展,逐

漸被用於韻書、等韻音圖等等，所以《四聲譜》雖然在中土久佚，但其後繼者所發展衍變出來的大量的公開成果，卻一直流傳下來，對漢字字音分析的發展，具有極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意義。

Abstract

The theme under study is at once old and new, it is of significance and highly complex at the same time. By way of thorough and in – depth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concerned and analysis of primary documentation, the following new understandings obtain:

1. It can be established that “qie/切” versus “fan/反” originally referred to two reciprocal activities: “qie” meant “to cut” whereas “fan” (literally “revert”) meant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shape (by combining the cut up pieces). Both “qieyin/切音” (literally “to cut sound”) and “qieyun/切韻” (literally “to cut rime”) originally referred to cutting up a syllable and later acquired the derived meaning of “syllable analysis”, while “fanyin/反音” and “fanyu/反語” originally referred to merging two different syllables (in a certain way) into one distinct syllable.
2. It can be established that the view expressed by Shen Kuo/沈括 and Zheng Qiao/鄭樵 that the study of “qieyun” had been imported from the West was for a long time a widely held hypothesis and is well attested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a. It was only from the Ming dynasty onwards that different views regarding the hypothesis flourished, some doubting or negative, others supporting or positive, and yet others compromising. This historical swing away from the old hypothesi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Siddham linguistics on the part of Chinese